

当代医学史研究转向的贡献、局限与新进路

Contributions, Limitations, and New Approaches in the Shift of Contemporary Medical History Research

张大庆 /ZHANG Daqing

(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, 北京, 100191)

(School of Medical Humanities, Peking University, Beijing, 100191)

中图分类号: R09; C532 DOI: 10.15994/j.1000-0763.2026.04.008 CSTR: 32281.14.jdn.2026.04.008

关于碎片化科学史研究的讨论, 与医学史有很大关联, 在医学史领域讨论程度更甚。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所的布里格(G. Brieger)曾经提到过医学史与科学史之间的关系, 并举例1930年代科学史家萨顿(G. Sarton)与医学史家西格里斯特(H. Sigerist)两人之间有关科学史与医学史关系的争论, 并指出两位学者虽有意见分歧, 但在如何提升医学史的研究水平和学术影响力方面观点却基本相同。

在医学史研究中, 20世纪发生过多次研究的“转向”: 如语言转向、社会转向、文化转向、身体转向、物质文化转向等等, 医学史作为跨学科领域, 在不断重塑自身的研究方法与学科边界。医学史从最初的“医生传记与科学进步”为主, 发展到探讨医学与社会、文化、政治、身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学科。这可能与学术研究的后现代的转向有关, 如研究性别、身体史研究、儿童史研究等, 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出现后更激发了大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。在医学史中, 大家意识到医学不仅是治病救人的科学, 在社会进程中还起到社会治理和知识生产的制度性实践的作用。例如我们共同经历的Covid-19, 防疫措施后来转变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。

不过, 在研究进路转向的过程中, 有学者提出: “转来转去都转晕了”。医学史研究变为了“没有医学的医学史”。

医学史研究早期的传统, 为实用主义的医学史。在经验医学模式时代, 学医者是通过医学史来学习前辈的经验, 以掌握诊断与用药知识。当代的传统医学教育仍然如此, 需要阅读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杂病论》等医学经典文献。实际上, 西方医学也是如此, 17世纪西方医学教育中, 希波克拉底、盖伦和阿维森纳的著作, 依然是主要的教材。这一时期的医学史研究与教学主要是汇集前人的成果, 将各种病症和诊断治疗的经验记录下来, 以便后人学习。另一个变化是疾病地理学的出现, 这与传染病的“瘴气”理论和历史病理学相关, 主要是了解疾病演变与地理、气候之间的关系, 它在德国最先出现, 现在也与生态学有关。当时主要讲述哪些疾病为什么在这些地方特别明显, 即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, 其目的在于帮助医生了解疾病的原因, 有助于更好的防病治病。

医学史教学主要在医学院校中进行, 成为学生了解医学的基础知识。例如,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开业典礼时, 邀请前来参加典礼的美国著名医学家、时任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(W. H. Welch)发表演讲, 他讲题目就

收稿日期: 2025年10月18日

作者简介: 张大庆(1959-)男, 湖北沙市人,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, 研究方向为医学思想史、科学技术史。Email: zhangdq@bjmu.edu.cn

是“现代医学的发展”，旨在强调医学史是学生认识与理解医学的基础。这一传统在医学院校一直保留至今。医学院的医学史研究和教学有明确的对象，目的是让医学生更好理解医学起到作用。医学院校上的医学史课程与历史系讲的医学史不同，在给历史系的学生讲课时，可能也会讲到医学史的知识，是在强调某些疾病可能在历史社会中产生的影响。而医学史专业授课需要帮助医学生理解医学，同样科学史授课是有助于学生更全面地理解科学。

医学史家西格里斯特(H. Sigrist)关注到当时苏联的医疗保健制度对人民健康改善的重要性。他推行医学社会史研究，目的是理解美国医学的社会化问题。他希望通过公共卫生、人口统计研究，揭示医学知识的社会条件与公共性，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：偏重外部结构分析，忽视医学知识本身的内在逻辑与认知机制。他的医学社会史研究与后来1970年代的医学社会史研究旨趣有所不同。关于1970年代美国医学史的研究，与其他老师刚才所讲的内容相似，即随着社会学、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转向，医学史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方向。研究者更加强调医学是一种以医学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建构，将疾病不仅视为生物学事件，还视为社会文化事件，许多研究都涉及到医疗实践的伦理问题、社会问题、文化问题，扩展了医学史的解释维度，不过也导致了一种“碎片化”的局面，让医学史日益远离医学本体与医学教育的要求。

另一个问题是，美国医学院校的医学史教学开始被削弱，原来的必修课开始减少，很多已经变成选修课。这主要与医学科学知识增长较快，医学教育不断增加新的课程，而传统的医学人文社会学科的课程不断被削减。然而，随着医学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，器官移植、脑死亡、安乐死、生殖技术等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伦理法律问题，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医学教育难以满足应对不断增多的新问题，因此1977年，恩格尔提出了生物-心理-社会模式(Biopsychosocial Model)，在此背景下，医学人文课程再次回到医学院的教学体系之中。包

括医学史在内的医学人文学科研究也随之增加，以帮助医学界与社会认识与理解当代日益复杂的医学问题，

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，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，但慢性病、退行性疾病、生活方式疾病却与日俱增。引发了人们对出现这种现象的不同解释和争论。对当代医学的批判提出了“临床医源性疾病”(clinical Iatrogenesis)，即某些临床操作可能是疾病的原因，如过度诊断与过度治疗；“社会医源性疾病”(Social Iatrogenesis)，即生活的医学化，将日常生活事件转化为医学事件，指出现代医学如何在社会结构中制造新的依赖与不平等。

医学史研究由此出现了文化转向与身体转向，研究者引入福柯(M. Foucault)的理论，研究医学化的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医学化问题，例如节食、减肥、整容、纹身、变性、个人装扮、性“增强”和心理“增强”药物等，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，艾滋病问题的出现，进一步激发了研究者对身体问题的关注。这类身体史、性别史的转向，更加关注身体的自我文化问题，其中的很多研究将医学视为社会规训工具，身体本身也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文化产业，身体史研究者认为，“权力”不仅可通过社会和政治制度发挥作用，也可以通过直接作用于身体来发挥作用。

此外，由于卫生宣传、诊疗技术的可视化，例如彩超可以直接看到胎儿、CT、核磁、PET-CT等可以准确观察人体内部图景，甚至可以通过大脑血流显像观察个体情绪变化等，身体已成为“透明的身体”。医学史研究的视觉转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医疗行为的动态图景。20世纪90年代以后，开始了物质文化的转向，即研究者从原来关注文本、理念与制度，转向关注医疗实践中具体的物质对象，如诊疗技术、器具，如X光、心电图机和其他设备，各种药品，医院的空间布局等。研究者希望借此重构医疗实践的真实场景、揭示诊疗知识生成的具体机制，让医疗问题不再仅仅是医生直接看病的问题，而是在医疗空间中，整体的人际关系，包括患者、家属、医生、护士等医务人员多重层次。

全球疾病的传播问题方面，疾病社会文化史和全球健康史研究受到学界关注。这并非碎片化的过程，而是一个整合过程。在人类经历了几次重大传染病后，如艾滋病、SARS、Covid-19之后，刺激了对于疾病史和跨文化的疾病研究。例如1981年发现艾滋病时，美国的一批学者在1989年就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艾滋病历史的研究书籍。

总体上看，这些“转向”是一把双刃剑，它既拓宽了我们的视野，同时也有其局限性，让我们对传统医学史领域的兴趣逐渐减弱，使得医学史与医疗实践本身脱节，在医学知识史、技术史和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，对医学知识生产和医学争论等问题关注不足。

我认为今天有关“科学史研究碎片化”题目的讨论非常重要，我们忽略了科学史知识本身重要性的研究，碎片化就是切割之后，忽视了科学本身，忽略了科学知识生产历程的研究。我大致搜索了自2000年以来出版的当代科学史研究著作，几乎没有中国学者在前沿科学的学

科史方面的著作。20世纪之前，中国科学家很少参与科学知识的生产，主要是学习、引进。因此，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不书写当代科学史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我们很少有人参与科学知识生产。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，目前许多前沿科学家都在参与当代科学知识的生产。如果，中国学者仍然需要等待外国学者撰写后，再进行翻译和学习，那么我们的科学史研究将永远落后于国外。

因此，我们应当关注当代科学史的研究，希望这次讨论能促进大家对当代科学史研究的重视，经过一段实践的努力在这方面取得一定的进步。我认为从历史角度审视科学问题，是科学史家的责任。科学家从实验室审视科学问题，而历史学家从历史角度审视科学问题。既然我们从事科学史，就需要从科学史的眼光来认识与理解科学。我们应该有所作为，推动我国当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发展。

[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]

(上接第34页)

[参考文献]

- [1] 黄仁宇. 关系千万重[M].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1, 35.
- [2] Freshwater, H. 'The Allure of the Archive: Performance and Censorship'[J]. *MoveableType*, 2007, 1 (3): 5-24.
- [3] Bernal, J. D. *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*[M]. London: George Routledge Gsons Ltd, 1946, 10.
- [4] 王晴佳.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[J]. 近代史研究, 2012, (5): 12-16.
- [5] Golinski, J. 'Is It Time to Forget Science? Reflections on Singular Science and Its History'[J]. *Osiris*, 2012, 27(1): 19-36.
- [6] Kranzberg, M. 'At the Start'[J]. *Technology and Culture*, 1959, 1(1): 1-10.
- [7] Seely, B. E. 'SHOT,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,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'[J]. *Technology and Culture*, 1995, 36(4): 739-772.
- [8] Van der Vleuten, E. 'Technology, Societal Challenges, and Global Sustainability History'[J]. *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*, 2019, 24(2018): 34-52.

[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]